

对上海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及发展的认识与思考

上海市统计局课题组

(上海 200003)

摘 要: 从周期规律看,自 1978 年以来上海经济运行表现为 4 个发展阶段,从第 2 个周期开始平均经济增速出现下移,目前下移趋势更为明显。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上海已处于发达经济体行列。从经济结构看,上海产业演化进入以服务经济为主的发展阶段。上海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体现在传统实体经济优势趋向弱化,物量规模的扩张面临极限,全社会劳动生产效率增长放缓,创新驱动发展仍在徘徊中。对外贸易、金融创新、收入分配格局、财税体制、城乡一体化以及宏观经济统计改革等领域,是上海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 经济增长 阶段转换 转型升级 深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1309(2014)08-0009-010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上海经济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经济运行周期、经济需求和产业结构均呈现明显的阶段变化。在此背景下,上海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正确认识和把握外部环境对上海转型发展阶段形成的危机与机遇,妥善处理自身的发展难题和矛盾,以新的判断、新的思路来应对深化转型发展时期的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上海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周期规律

(一) 经济运行格局的 4 个发展阶段:经济周期和物价周期

上海经济运行的周期变动离不开全国经济周期的大背景,但与全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水平有明显差异。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不同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分组标准,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开始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而上海已经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2013 年,上海人均 GDP 达到 13524 美元,为全国人均 GDP 数的 2 倍左右(见图 1),这也意味着上海经济进入了转型的关键期和攻坚期,前期快速发展阶段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如生产要素动力、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改革创新等瓶颈约束比全国更加突出。

课题组长:秦丽萍。课题组成员:甄明霞、周群艳、陈君君、张诚。执笔:甄明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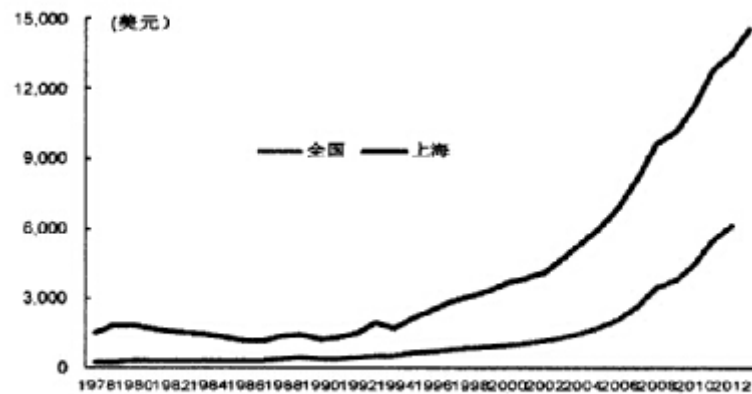


图1 上海与全国人均 GDP 变动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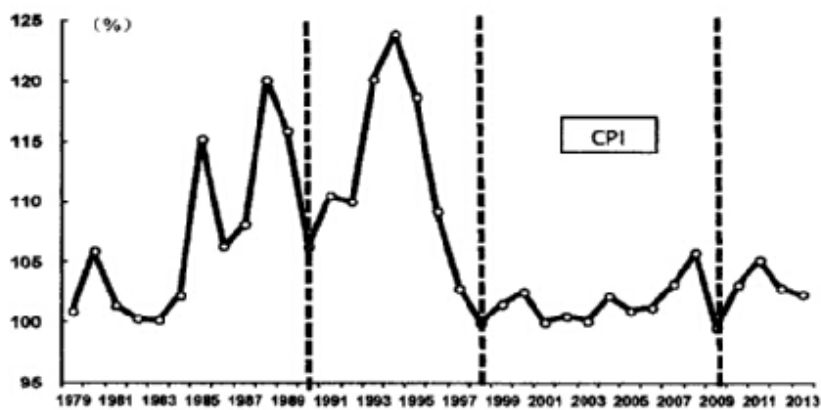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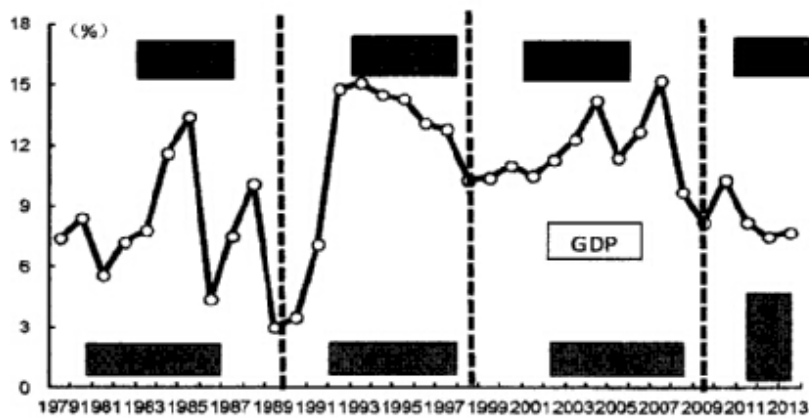


图2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济增长(GDP)与物价水平(CPI)周期变动趋势比较

具体地说，遵循“波谷一波谷”的周期划分法，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济运行表现为 4 个发展阶段：第一发展阶段为改革起步阶段（1979 — 1989 年），第二和第三发展阶段为高速增长期（1990 — 1998 年和 1999 — 2009 年），第四

发展阶段为 2010 年以来进入的深化转型期。从上海 4 个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速看，自第二阶段开始，平均经济增速出现下移，而第四阶段内的下移趋势更为明显，年均增速从 11.7% 下移到 8.2%，但仍比第一周期内高 0.4 个百分点。

1. 第一周期：低增长高通胀经济运行格局。1978—1989 年，上海经济增长相对缓慢，GDP 年均增长 7.8%，CPI 年均上涨 6.7%。这一时期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计划在要素配置中还发挥着很大作用，经济增长呈现出典型的高波动特征。从供需关系看，这一时期供给能力比较薄弱，在需求大于供给的形势下，消费价格水平高涨。

2. 第二周期：高增长高通胀经济运行格局。1990—1998 年，经济增长快步加速，GDP 年均增长 11.7%，CPI 年均上涨 11.8%。在这一时期，上海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开始了全面的改革开放，经济增长呈现出快速提升以及局部缓慢下行的波动态势。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物价水平也持续大幅上涨，表现为高增长高通胀的经济运行格局，居民消费价格、生产价格等主要价格水平全面大幅上涨。

3. 第三周期：高增长低通胀经济运行格局。1999—2009 年，上海经济持续两位数增长，GDP 年均增长 11.5%，CPI 年均上涨 1.6%。在这一时期我国加入 WTO，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经济运行的平稳度明显提高，波动性较小。由于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大，供需结构转向生产过剩，物价水平温和上涨，宏观经济持续

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运行局面。

4. 第四周期：低增长中通胀经济运行格局。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上海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进入新的转型发展阶段。2010—2013 年，上海 GDP 年均增长 8.2%，CPI 年均上涨 2.7%。从经济增速看，2012 年上海经济增速回落到 8% 以下，这是自 1992 年以来经济增长率首次回落到低于 8% 的区间。从物价水平看，这一时期，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特点比较明显，虽然 CPI 涨幅比较平稳，但在货币型通货膨胀的推动下，资产类价格涨幅较大。

（二）经济发展的需求结构演变阶段：投资需求向消费需求的转换

从“三大需求”衡量指标的 GDP 支出法核算中的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结构变动看，1978 年以来，上海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虽然总体呈现为上升趋势，但历经了最终消费率低于投资率的阶段、投资率超过最终消费率阶段以及最终消费率再次超过投资支出阶段。特别是，2008 年以来上海最终消费率加快上升态势明显，到 2012 年提高至 57.1%；投资率则从 1996 年最高的 66.2% 下降到 2012 年的 38%。而从全国三大需求变动趋势看，1978 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总体呈现为持续下降的态势，直到近两年才开始有所回升，并且最终消费率始终高于投资率。2012 年，全国最终消费率为 49.5%，投资率为 47.8%。总之，上海三大需求的演变特征与全国明显不同，反映了上海经济需求结构的调整与再调整过程，进入了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而全国经济对投资需求的依赖可能仍需要一段时间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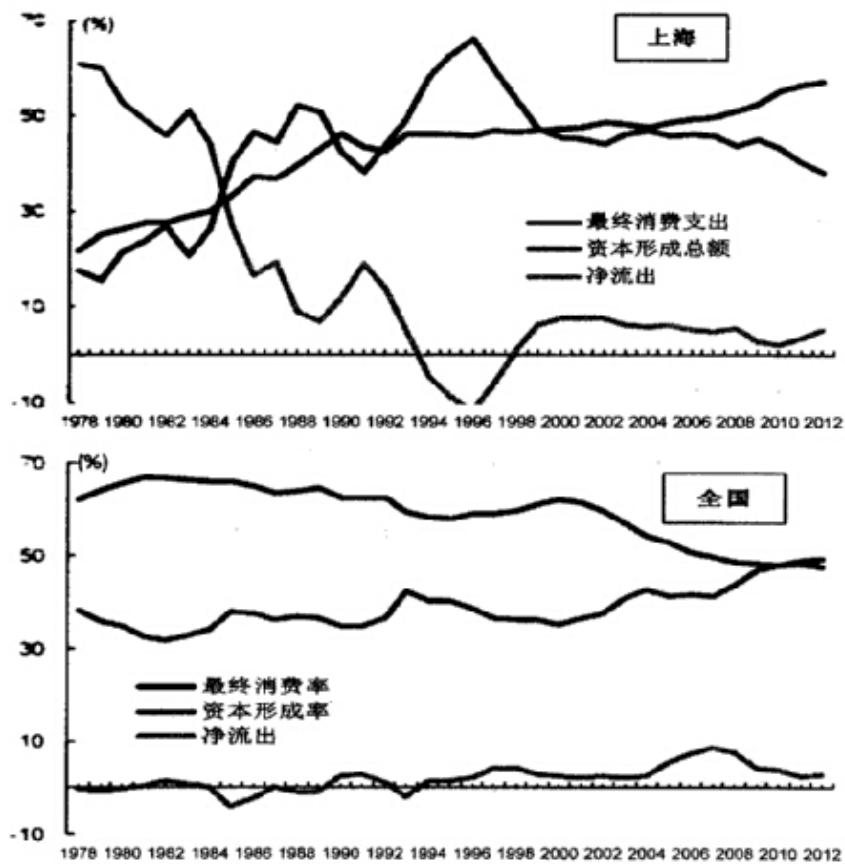


图3 上海与全国三大需求结构变动趋势比较

1. 第一阶段：表现为典型的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特点。1978—1991年，上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6.2%，而外贸出口年均增长仅5.1%。这一格局与全国基本一致。但全国三大需求增长速度差异不大，年均增速分别为19.9%、14.8%和16.6%。与全国相比，上海对外开放在这一时期落后于全国，外贸出口增速低于全国。

2. 第二阶段：形成了投资和外贸拉动的特点。1992—2007年，上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7.6%，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0.8%，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增幅超过20%。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上海对外贸易也由此开始了快速增长，2002—2007年，外贸出口年均增长超过35%，远远高于同期投资和消费增长。在这一时期，全国投资、消费和出口年均增幅分别为22.3%、14.5%和19.4%，上海三大需求增长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 第三阶段：经济需求动力转向消费需求拉动的格局。2008年以来，上海环境资源约束已接近极限，投资边际效应递减，以投资拉动的扩张性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扩大消费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从三大需求看，这一时期消费增长明显高于投资和外贸增长。2008—2013年，上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回落到4.6%，外贸出口年均增长回落到7.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3.0%。这一时期全国三大需求年均增幅分别为22.4%、10%和16.8%，投资增长仍明显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上海三大需求增速全面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1 上海与全国三大需求增长的阶段变化

单位：%

年 份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外贸出口	
	上海	全国	上海	全国	上海	全国
1979 - 1991	16.2	14.8	24.0	19.9	5.1	16.6
1992 - 2008	15.6	14.5	22.6	22.3	20.8	19.4
2008 - 2013	13.0	16.8	4.6	22.4	7.3	10.0

（三）经济发展的产业演化阶段：进入服务经济为主发展阶段

1978 年以来，上海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经历了 3 个阶段性变化：第一阶段为 1978 — 1997 年，这一阶段三次产业结构呈现为“二三一”格局，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从趋势看，第二产业比重虽然高于第三产业，但第二产业比重总体呈现为下降趋势，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从 18.6 % 提高到 46.3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从 21.6 % 提高到 38.2 %。第二阶段为 1998 — 2004 年，这一阶段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其中 1998 年为重要的转折点，但产业结构演变的稳定性不够，2003 和 2004 年第三产业比重有所波动、反复。在这一阶段，第三产业比重从 48.8 % 提高到 50.8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从 41.5 % 提高到 54.2 %。第三阶段为 2004 年以后，上海第三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第三产业比重从 51.6 % 提高到 2013 年的 62.2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达到 56.5 %。总体判断，上海第三产业比重超过 60 %，标志着上海进入了以服务经济为主的发展阶段。

而从全国看，三次产业的结构演变处于去农业化的工业化阶段，第一产业比重从 31.3 % 下降到 10 %，第二产业比重稳定在 44 % 左右，第三产业比重略高于第二产业。虽然上海的产业结构能级高于全国，但从经济发展阶段的规律看，目前上海第三产业比重仍相对偏低，不仅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相同发展阶段 65 % 以上的比重，也低于目前北京 76.5 % 的比重。上海第三产业比重波动趋势和相对偏低的状况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与上海经济发展的需求格局密切相关。三次产业比重反映的是一种生产结构，这种生产结构是与最终使用结构相对应的，不同的需求结构对应着不同的生产结构。长期以来，经济需求结构以投资为主，较高投资率和较低消费率更加有利于工业发展，而不利于服务业发展。二是与积极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发展格局密切相关。这种产业转移格局促使上海的制造业和外贸出口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服务业比重上升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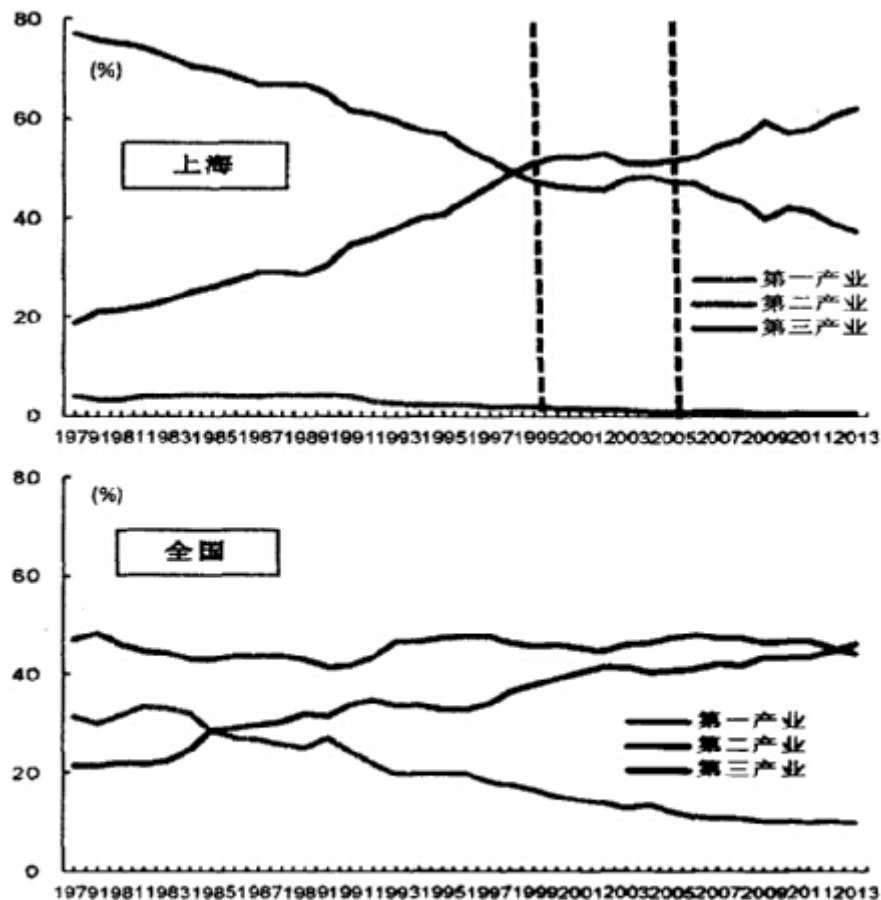


图4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与全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动趋势比较

有利于工业发展，而不利服务业发展。二是与积极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发展格局密切相关。这种产业转移格局促使上海的制造业和外贸出口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服务业比重上升的空间。

二、如何认识和把握外部环境对上海转型发展形成的危机和机遇

(一) 国际形势新发展：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周期趋势与重大格局发生复杂变革 1980 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呈现为明显的 3 个阶段，一是 1980 — 1990 年代 20 年的稳定增长时期；二是 21 世纪以来在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的带动下，全球经济增长进入了上升区间；三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本轮金融危机宣告了 1980 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革命而诞生的长达 30 年的新经济增长周期的结束。2009 年后，全球经济开始了艰难曲折的复苏之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全球货物贸易仍然疲软，这需要我们改变长期以来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和全球贸易模式正在产生深刻的调整与变革，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并加以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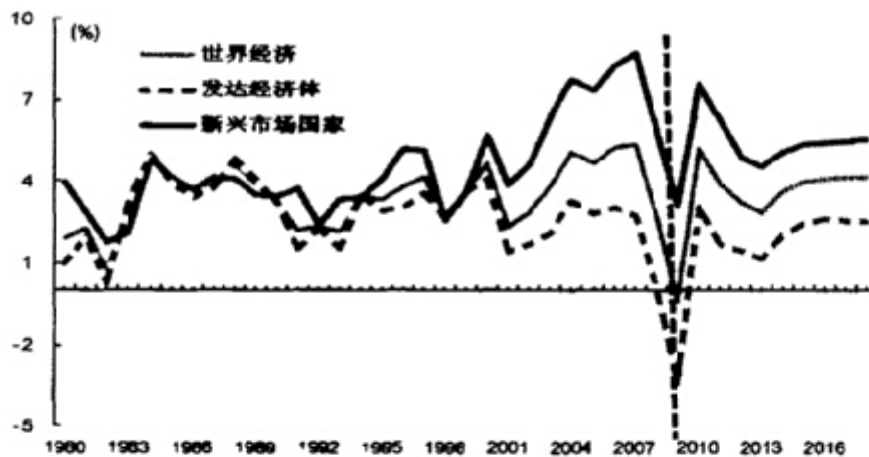


图5 全球经济增长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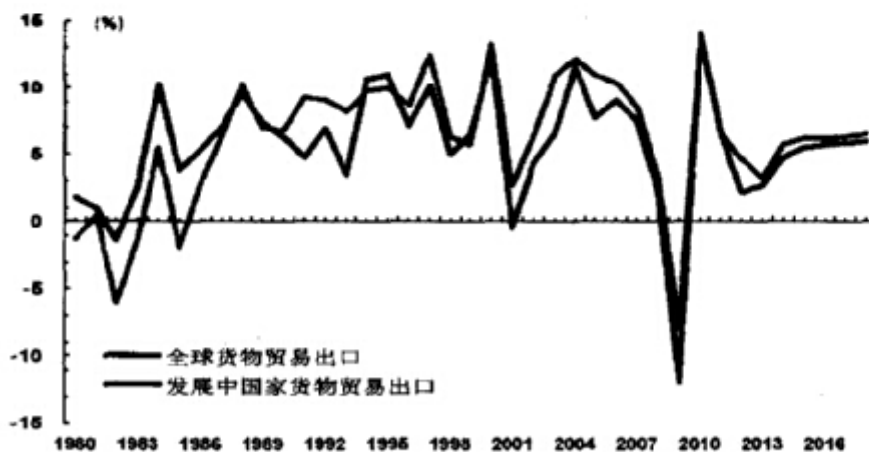


图6 全球货物贸易增长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 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复杂变化,经济增长重心面临轮动。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崛起是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全球经济增长点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我国也是这个转移过程中的重要核心,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进一步此消彼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扮演着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引擎角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得到提升。2000年,美国、欧洲和日本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72%的峰值,而2012年全球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超过50%。但也要看到,近两年来,全球经济复苏格局呈现出新的变化,新兴经济体遭遇发展瓶颈,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恢复力度增强。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经济换挡,进入“低增长、高风险”状态,长期面临着全球化和改革红利减退的挑战,短期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资金短缺和金融危机。从发达国家看,美国具有低利率、低能源价格、市场和技术创新等优势,经济增长具备长期潜力,欧洲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日本经济稳步前行,并缓解了长达10年的通缩困局。虽然新兴市场国家进入换挡期后经济增速仍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但发达国家在创新技术发展和产业核心竞争力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每一轮大的经济危机后,新的增长动力都来自于技术的重大创新和进步。

2. 全球经济发展方式发生深刻转变，全球产业布局大调整。这一转变的核心是发达国家高负债、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难以继。全球产业经过了 20 多年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历程，这一历程也伴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发展轨迹。而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发展战略，在“再工业化”战略推动下，以技术创新为依托的新兴高端制造业可能在发达市场进一步兴起，将使发达经济体在产业链高端环节的优势更加明显。未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发达经济体将主要占据产业链高端环节，中低端环节仍将集中在新兴经济体。新能源革命成为影响全球经济领域的新因素，美国页岩气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能源开发成本，使美国与新兴经济体在制造业成本领域的竞争成为可能。这也使全球能源消费的重心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转移，全球能源版图的重塑使传统能源出口国面临挑战，新的市场供求关系将逐步形成。全球产业布局从以离岸为主转向在岸为主，钟摆式的全球化经济和产业分工模式已经过去。这意味着我国 20 多年开发经济模式将发生变革，中国经济需要以新的方式参与全球化竞争。

3. 全球服务业竞争成为占据价值链高端的核心，数据服务创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新技术的创新将为全球经济长期增长提供动力，3D 打印技术、新能源技术为未来技术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方向，物联网、云计算、智慧地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数据”概念，将改变全球产业、经济和贸易模式。传统三大产业中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界线将日趋模糊，制造业的核心内容将转向以研发、设计为主，制造业与服务业将面临深度融合。主要发达经济体仍将控制全球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利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优势和信息技术优势推进数据服务的可贸易化，在贸易方式上，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成为国际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的核心内容。服务业的竞争力成为决定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地位的关键因素，数据服务将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这些新的发展变化，需要我们尽快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货物贸易为核心、以实体制造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业。

（二）国内经济新转换：我国经济增长进入阶段转换期，警惕结构性衰退

1. 我国经济增长正从高速向中速阶段转换，处于新一轮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周期的初期。

当前，随着改革红利逐渐消失、经济结构失衡、创新能力弱等制约因素的凸显，我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进入了下降阶段，这表明我国经济已从高速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并回落到改革开放之初的增长位势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周期规律，正确认识增长速度的放缓，把握新周期经济运行的阶段性特征，提升改革的空间和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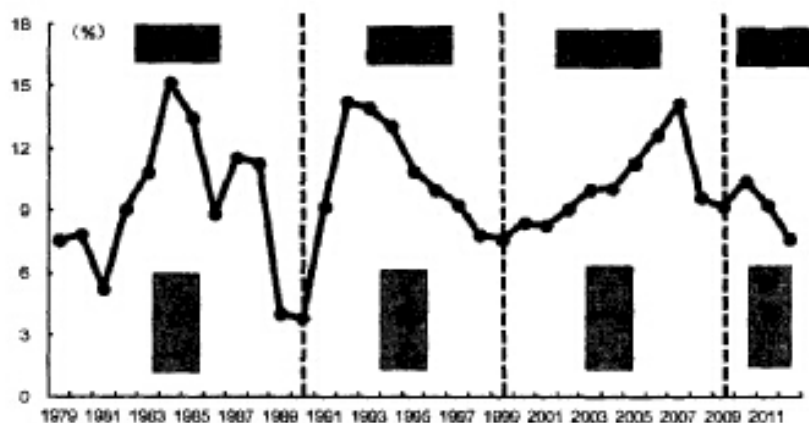


图 7 我国经济增长周期变动

2. 结构性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深化改革与调整的核心内容。我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自身

结构性问题，这是比经济周期性下行更为关键的问题，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内需与外需的结构失衡，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带来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如国际收支失衡、国内流动性泛滥等。二是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结构失衡，国民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拉动，带来产能过剩问题。我国的资本形成率已连续 10 年保持在 40 % 以上，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 2 倍，最终消费率则远低于发达国家 70 % 左右的水平。尽管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客观上仍需要投资的较快增长，但长期的高速增长使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性扭曲，国民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受到严重影响。三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长期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有利于政府和企业，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重不断下降。四是城乡发展结构性失衡，城乡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存在着显著的二元差距。这些结构性失衡问题造成的结构性衰退，需要通过宏观调控手段的深刻变化来加以系统解决，这也是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三、经济发展阶段转换背景下的上海发展思考：深化改革与转型升级

（一）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问题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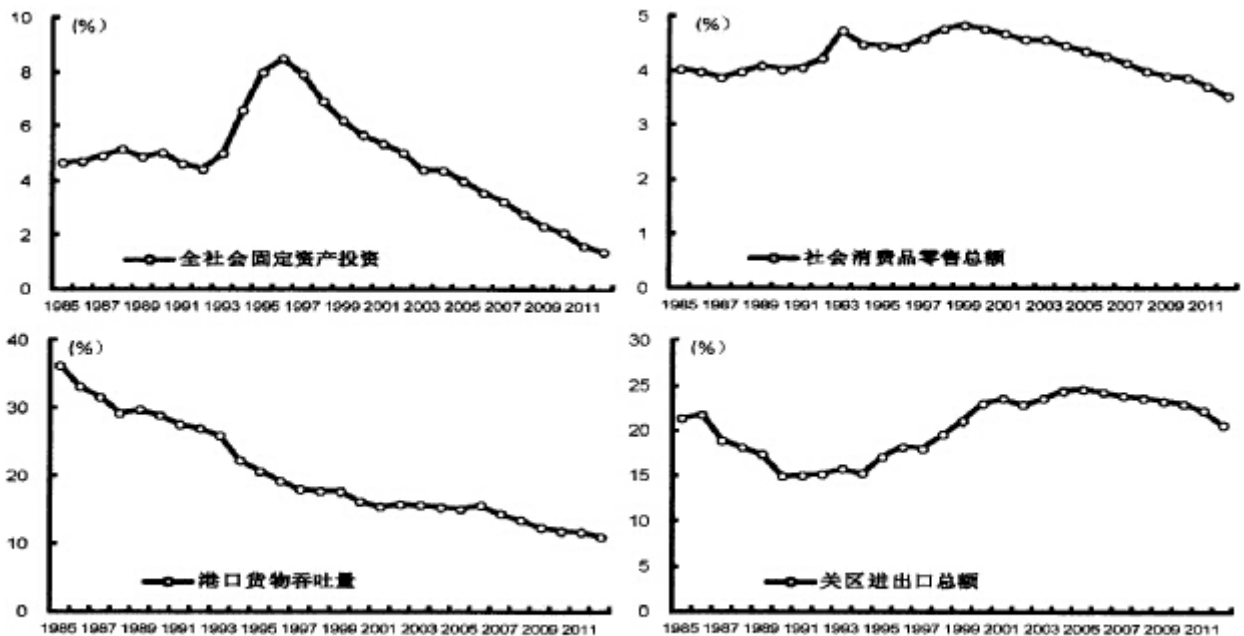


图 8 上海主要实物量占全国的比重变化

1. 传统实体经济优势趋向弱化。1990 年代以来，在全球制造业大转移的巨大机遇下，上海以土地、劳动力等综合商务成本优势，大量吸收外资，开始了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同时形成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发展模式。经过 20 多年的快速发展，综合商务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传统制造业发展的优势已逐步弱化，近年来，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重化工业等开始加速向外转移。2010 年以来，工业投资规模已连续 4 年停止扩张，工业生产增长减速。与此同时，新兴制造业处于起步阶段，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亟须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难以体现。

2. 物量规模的扩张面临极限。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产生了很大转变，经济增长从东部沿海向西部转移的态势明显，进入了“西高东低”的发展格局。由此也带来了实物量市场资源配置格局的转变。这种格局转换，使得上海实物资源配置在全国的中心地位逐步下滑（见图 8）。上海关区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峰值的 23.9 % 下降到 20.7 %，港口货物吞吐量从峰

值的 36.2% 下降到 11.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峰值的 8.5% 下降到 1.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峰值的 4.8% 下降到 3.5%。这表明上海实物量规模扩张已基本达到极限，货物贸易、交通流量、制造业、实物消费等实物量指标也在接近极限。3.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1992 年以来，上海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呈现为两个变化阶段。1992—2002 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明显快于全国；从 2003 年开始，转入慢于全国的发展阶段（见图 9）。

1992—2002 年，上海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12.8%，全国年均增长 9.1%；2003—2012 年，上海年均增长为 7%，而全国年均增长为 9.9%。上海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明显下调，虽然这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但也反映了上海作为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后发效应释放接近极限，发展模式亟待转型。当经济整体转向以服务型为主时，受服务经济的生产率提升慢而规模占比提升快的拖累，全员劳动生产率升速放缓。从上海看，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长期以来一直低于第二产业，近几年来才略有赶超。上海经济结构转型的症结，主要在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有待大幅提升。

4. 创新驱动发展困难很大。上海房地产业等财富型行业加快发展，分散了城市经济发展的重心，给上海经济走创新驱动道路带来了很大的干扰，导致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过于倚重土地和房地产拉动，而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小。房地产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仍超过 5%，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 50%（见图 10）。2001—2013 年，土地交易价格指数上涨了 2.3 倍，商品房价格上涨 5.1 倍。而成为创新城市，是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和国际大都市的要求，走创新驱动道路是未来上海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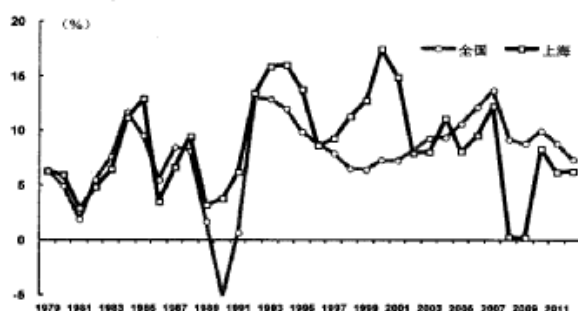


图 9 上海与全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变化趋势



图 10 上海房地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二）深化改革重点领域的形势分析与思考

1. 关于对外贸易领域改革。1990 年代中期以来，在全球制造业大转移的机遇背景下，上海以其区位优势及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禀赋，成为外资制造业的重要集聚地，建立了外向型经济模式。我国加入 WTO，进一步推动了上海制造业和对外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上海制造业转入低迷，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出现转折（见图 11）。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例从 2007 年的峰值 179.3% 下降到 2012 年的 126.5%。从上海来看，以货物贸易改革开放为主的制度环境必须改变，应抓住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实验的契机，深化服务业开放、服务业投资准入与服务贸易便利化，加快服务贸易发展，深化推动贸易中心建设改革。当前，上海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对外贸易体系的重要部分，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 1/4，与我国香港地区（27% 左右）和新加坡（30% 左右）逐步接近，服务贸易规模总量也在逐步接近我国香港地区与新加坡，但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其核心竞争力需要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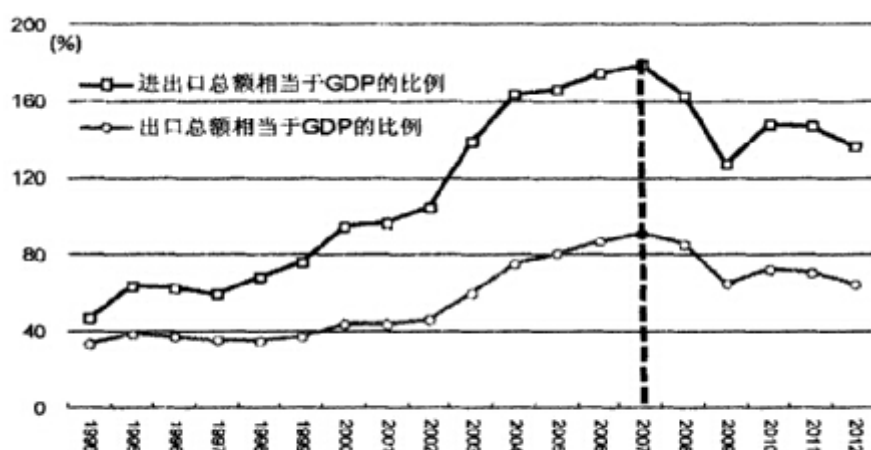


图 11 上海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动趋势

2. 关于收入分配领域改革。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不仅关系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转型问题，更关系社会公平问题。同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宏观经济领域的重大课题，在当前经济发展转型时期，如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以及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影响机制等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今后分配改革领域的核心。从上海看，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重呈现为从整个 1999 年代和 21 世纪前 5 年的相对平稳到 2005 年以来的稳步持续上升态势（见图 12）。上海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重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8% 左右），但与全国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的趋势不同，上海自 2005 年以来呈现为明显上升态势。从主要的发达国家看，劳动报酬占比一般保持 50% 以上的水平比较合理。



图 12 上海 GDP 四要素结构变动趋势



图 13 上海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变动趋势

3. 关于金融发展领域改革。2013 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13.1%，与我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基本一致。金融市场成交总额占全国的比重达到 80% 以上，金融市场交易规模已跻身世界前列，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额位居全球第 4 位，股票市值位居全球第 7 位。虽然金融中心建设的规模得到快速扩张，但上海与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之间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上海要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需着力解决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如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金融市场法制建设、准人制度等。上海自贸试验区在金融领域的先行先试是重要契机，要加快金融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和国际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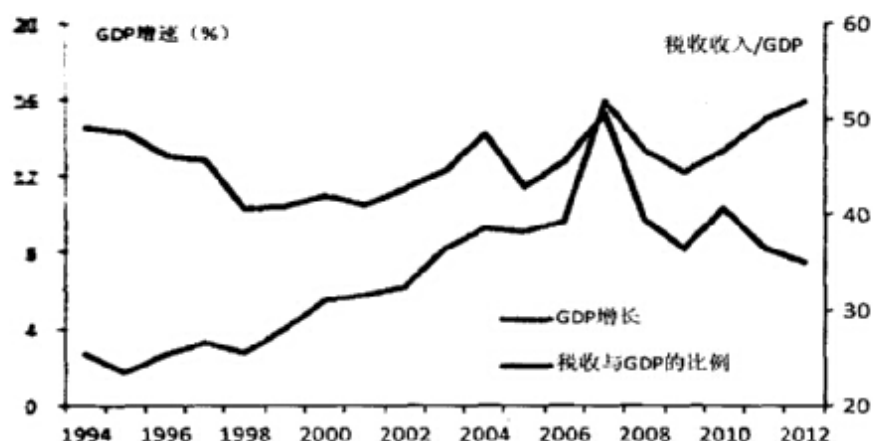


图 14 上海经济增长和税收与 GDP 比例的变动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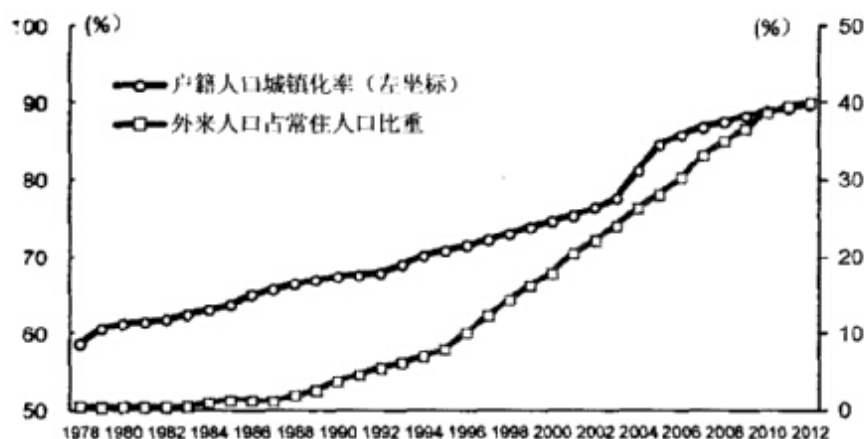


图 15 上海户籍人口城市化率

4. 关于财税体制机制改革。一直以来，税收政策更多是以税收增长为目标，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作用未被充分重视。2008 年以来，上海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但税收占 GDP 的比例仍在继续提高，这与发达国家的 GDP 增速与税收占 GDP 比例趋势基本一致有很大差异。税收占 GDP 的比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宏观税负水平，要高度重视宏观税负的持续上升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避免形成拉弗曲线效应^①。因此，要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

5. 关于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从城市发展阶段看，上海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接近 90%，正处于诺瑟姆曲线^②的第 3 个发展阶段，上海城镇化发展已进入后期并逐步逼近饱和值，未来城镇化率的提高将非常缓慢，城镇化的推进应更多地体现在质量上突破，主要聚焦于体现以人为本、土地集约利用、产业协调发展以及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高质量城镇化上。

6. 关于宏观经济统计领域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国家统计局已经建立了一套用于反映地区经济转型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情况的指标体系。从其中的 13 个核心综合指标看，其与上海经济转型升级特点是一致的，如税收相当于 GDP 的比例、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居民消费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等指标，能真实反映上海经济转型的情况。除此之外，加快建立和完善具有上海特点的经济转型升级指标体系成为新的迫切要求，如淡化 GDP 增长速度、强化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形成定期的监测分析等。二是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长期以来，国家 GDP 统计数据与地方 GDP 统计数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目前，国家统计局已经制定了详细的时间表，2015 年将实行国家和地方 GDP 的统一核算。在统一核算的背景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修订的主要内容有利于科学、合理地核算上海的经济总量，有利于体现上海经济在全国的地位，更有利于体现上海经济发展转型的成效、经济结构优势和新兴经济业态的发展。

① 一般情况下，税率越高，政府的税收就越多；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描绘这种税收与税率关系的曲线叫作拉弗曲线。

② 美国城市学者诺瑟姆提出了“城市化过程曲线”。经过实证研究，可以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过程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 S 形曲线，即呈现出一条“逻辑斯蒂”曲线，并把城市化过程分成 3 个阶段，即城市水平较低、发展较慢的初期阶段，人口向城市迅速聚集的中期加速阶段和进入高度城市化以后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又趋缓慢甚至停滞的后期阶段。